

# 中共與蘇聯關係對東北亞情勢之影響

尹慶耀

## 一 引言

中共自稱它與蘇聯的分歧始自一九五六年，那麼在它們三十年的關係當中，中共向蘇聯「一邊倒」的友好時期還不滿十年，其後就展開或急或緩的鬭爭。促成它們分裂的因素極為複雜，其鬭爭是全面性的，遍及各個地區與各個領域，且與國際局勢相互激盪。惟若就其鬭爭的形式、重點與特徵言，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在黑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ëv）當政時，中蘇共黨之間以理論鬭爭為主，那是對外如何埋葬資本主義、對內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之爭，以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共發表「九評」<sup>①</sup>為高潮期。

中蘇共黨的理論之爭，逐漸影響到國家關係，一九六三年左右，即有邊界問題的提出，但那是鬭爭之果而不是分裂之因。布里茲涅夫（Leonid I. Brezhnev）政權上台後，中共有文化大革命導發的「造反外交」，東歐有經濟改革引起的自由化運動，克里姆林宮漸有動用武力解決集團內糾紛的傾向，於是有一九六八年八月的捷克事變，一九六九年三月烏蘇里江的珍寶島事件和同年八月新疆的裕民縣衝突。其時傳說蘇聯有對中共實施預防性核子突襲的計劃，因美國反對而未成為事實。這一個階段，是中共與蘇聯的軍事鬭爭時期，以一九六九年為高潮。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自由世界盛倡冷戰時代結束、談判時代到臨之說，「低盪」、權力平衡觀念流行，國際間展開多元外交。另一方面，捷克事變後，「布里茲涅夫主義」（即「有限主權論」）登場，暗示蘇聯有權派軍對其他共黨國家作干涉，這使中共異常震驚，想轉而向美國「投保」（艾索普 ALSOP 語），於是中共與美國勾搭，與蘇聯之間就進入外交鬭爭時期。然而十年來的外交鬭爭，使中共在共黨集團陷於孤立，在第三世界漸居下風，為求突破蘇聯的包圍，並急求現代化以充實本身對抗蘇聯的力量，從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起，中共將其外交活動重心由第三世界移向第二世界及第一世界中的美國，它與西歐建立相

註① 在此期間中共連續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且指黑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

當關係，與日本簽訂「和平友好條約」，與美國宣布關係正常化，蘇聯當然不得不急謀對策，而北平與莫斯科的外交鬭爭，也就漸入高潮期。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蘇聯與越南簽訂為期廿五年、具有准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造成中共直至廿一世紀都要腹背受敵的不利形勢。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一、二月間訪美，公開呼籲為對抗蘇聯的霸權主義，美、日、西歐和中共應該團結一致，且曾兩度表示要「教訓」越南，歸途中在日本又聲言要給越南一次「懲戒」。二月十七日中共進軍越南，其企圖在阻撓河內「印支聯邦」計劃的實現，藉以考驗進而動搖蘇越關係。更重要的是使美、日、中共新的聯盟或新的反霸統一戰線固定化、明顯化，以與蘇聯對壘，但都未達成目的。四月三日中共五屆「人代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俟「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期滿後不予延長。當日，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就將此一決定面告蘇聯駐平大使伊·謝·希契爾巴科夫（Ilia Sergevich Shcherbakov）。至此，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已惡化到相當程度。但中共似乎不願與蘇聯處於無條約的危險狀態中，因而黃華在通知蘇聯的同時，又建議「中（共）蘇雙方為解決懸而未解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舉行談判」<sup>②</sup>。

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正常化談判，已於上述情勢下在莫斯科開始，其結果如何，將影響到整個國際關係尤其是東北亞情勢。

## 二 中共與蘇聯關係現況

中蘇共黨於一九六三年七月在莫斯科會談改善兩黨關係失敗，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共拒絕派團參加蘇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此後中共的代表大會，不邀請外國共黨代表團參加。中共與蘇聯之間，不再派黨政代表團互訪，中共且曾屢次拒收蘇共函電。兩黨之間迄今仍有理論與策略的分歧。但中共與蘇聯之間，仍有大使級的外交關係及經濟貿易關係，其文化協定亦未廢除<sup>③</sup>。惟雙方也有邊界糾紛和軍事對峙，小規模武裝衝突更時有所聞。

「懸而未決」的主要為邊界問題，惟中共所爭不在領土。它已聲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割佔的中國領土（一五〇多萬平方公里），對方違約多佔的領土（三萬三千五百平方公里），原則上必須歸還，但也可考慮調整。又據某蘇聯學者透露，所謂「爭議地區」中黑龍江與烏蘇里江部分約三〇〇多個島嶼大部均已商談解決，珍寶島已歸中共管理，僅伯力（Khabarovsk）對岸之黑瞎子島，計三〇〇平方公里，尚在爭議中<sup>④</sup>。

註② 香港《文滙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第一版。

註③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十月二日）第廿八版，曾轉載《人民日報》「中國（共）對外關係示意圖」，請參閱。

註④ 轉自寺谷弘壬「中（共）蘇可能和解嗎？」日文ASIAN REPORT（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六一—七頁。

中共主張分清歷史是非，承認過去中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應另訂新約代替舊約；要承認邊界問題的存在，在未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共）蘇雙方武裝力量從「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sup>⑤</sup>。中共並不急於解決邊界問題，它企圖藉此題目展開對蘇鬭爭，以達下述目的：(1) 強調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性質，揭露其新沙皇的真面目；(2) 抑制內部親蘇傾向，並為內部困難轉移視線；(3) 藉此一問題鼓動與蘇聯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共同反蘇；(4) 以本身反蘇姿態接近西方，博取實質利益。不過，中共對於蘇聯的大軍壓境，深感寢饋難安，希望它能早日撤退。

蘇聯立場與中共相反，它不承認邊界問題的存在，並增強邊境軍力，壓迫中共神經，加重中共隨同備戰而來的經濟負擔，以待其屈服。

### 三 中共與蘇聯的政策原則

黃華通知蘇聯廢約時，根據「人代常委會」決議，「重申中國（共）政府一貫主張，中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這是早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共與蘇聯在北平舉行的副外長級邊界談判開始之前，中共就已提出的主張，迄今原則未變。

一九七六年二月廿四日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廿五次代表大會報告中說，在對中共關係方面，我們將與毛澤東主義繼續進行原則性的、絕不妥協的鬭爭；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將恪守平等、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不干涉彼此內政、不使用武力等原則，即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如果北平恢復真正以馬列主義為基礎的政策，不再有仇視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走上與社會主義陣營合作、團結的途徑，那麼這就可以為蘇中（共）良好關係的發展帶來一個機會。這種良好關係是符合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蘇聯迄今仍堅持這三項原則。這可由蘇聯「遠東問題」雜誌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刊載的「圓桌會議：有害和平及社會主義」一文作為證明。

兩者相較，雙方都要堅持原則鬭爭，在理論策略上不容易妥協；蘇聯還希望中共依然會返回蘇聯集團，那也并非短期內可以實現的。不過，雙方都聲言願在和平共處原則上，促使國家關係正常化，這是需要加以解釋的。

在共黨的辭典中，「和平共處」原則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中共首先提出要求，要與蘇聯在此原則上改善關係，即表示不承認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二年三月廿日布里茲涅夫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代表大會上說，中國（共）官方代表，聲言蘇中（共）關係可以根據和平五原則改善，北平方面不願較此更進一步，就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準則作改善。既然如此，我們認為現在蘇中（共）關係奠基於和平五原則上也好。這表示，蘇聯已認同了此項原則。上述黃華建議以及今（一九七九）

註⑤ 中共「外交部」文件——駁蘇聯政府（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的聲明。〈新華社〉（同年十月八日）北平電。

年六月五日蘇聯給中共的備忘錄中，都重提五原則，這就表示當前中共與蘇聯之間，仍只求有限度的而不是全面的改善關係。

## 四 蘇聯加強遠東軍力

談判時代給人的印象是，國際爭端的解決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外交。然而毋庸諱言，外交也是常常以實力為後盾。

尼克森主義原本就是以實力地位作基礎的。當前中共與蘇聯的談判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三日王幼平抵蘇後開始，中共試射中程飛彈、由山西發射，在羅布泊着陸的消息，也恰於此時傳出。十月一日在北平的西方軍事消息靈通人士透露，中共已於一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廿一日、九月四日，五次試驗長程飛彈<sup>⑥</sup>。這些都是中共有意透露，為其外交談判作實力後盾。至於蘇聯之重視力量，更勿庸贅言。

蘇聯在中蘇邊界增兵，始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駐東德蘇軍第一副司令貝利克 (P. A. Belik) 之調任外貝加爾軍區司令，他曾帶來幾個裝甲師。在外交鬭爭時期，蘇聯更不斷增強其遠東軍力。依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及美國政府方面情報，一九七八年中蘇邊界蘇聯駐軍四四師，六五萬人，一九六九年時為四〇萬，即十年間增加了二五萬人。其地面部隊主力在伯力 (距中蘇邊界四〇公里)。中共在北方邊界駐有八〇師，一六〇萬人 (連同地方部隊在內)，其三分之二在瀋陽軍區與蒙古前線<sup>⑦</sup>。

近年來蘇聯正致力開發西伯利亞及其遠東地區的經濟，那具有國防的意義。全長三、〇〇〇多公里貝姆 (BAM) 貝加爾至阿穆爾) 鐵路的修築，可將歐俄部分與其遠東地區連結在一起，直通到太平洋海岸，它不僅有經濟管道的作用，更具有戰略運輸的價值。一九七八年三月廿八日起，布里茲涅夫以久病稍癒之軀，親赴西伯利亞及蘇聯的遠東地區巡視，名義上是視察主要城市的經濟發展及貝姆鐵路幹線的建設情況，但主要隨員并非經濟官員而是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 (Dmitriy F. Ustinov)。布里茲涅夫此行曾至新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赤塔 (外貝加爾軍區司令部所在地)、伯力 (遠東軍區司令部所在地) 和海參崴 (太平洋艦隊基地) 參觀了各軍區的作戰演習以及海軍陣容，且發表演說，激勵士氣。

近年來蘇聯大幅度調動其東部將領，斯涅特柯夫 (B. Snetkov) 上將接替霍姆洛 (M. G. Khomuro) 大將任西伯利亞軍區司令。薩爾馬諾夫 (G. Salmanov) 上將接替貝利克上級大將任外貝加爾軍區司令。特勒提雅克 (I. Tretyak) 大將接替彼得洛夫 (V. I. Petrov) 上級大將任遠東軍區司令。魯啟夫 (P. Lushnev) 上將接替里雅希欽科 (N. G. Lyashchenko) 上級大將任中

註⑥ (1)香港 [文匯報]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三日) 第二版; (2)日本 [每日新聞] (同年十月二日) 第四版。

註⑦ 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局長塔納 (Stansfield Turner) 及國防情報局副長官艾倫 (Allen) 在國會聽證會的秘密報告。轉自古本昭三「一九七九年蘇聯的亞洲外交」，日文 [自由世界] (一九七九年) 三月號，廿三頁。原文未列秘密報告日期。

亞細亞軍區（司令部在阿拉木圖）司令。新司令的軍階均較其前任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青年將領。此外，一九七九年二月間傳說，蘇聯已新設「東部聯軍司令部」，統一指揮西伯利亞、外貝加爾、遠東各軍區，由蘇聯地面部隊第一副總司令、曾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在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衝突中直接指揮奧加登（Ogaden）地區衣軍作戰的彼得洛夫上級大將（即前遠東軍區司令）任總司令。這些似乎都是作戰態勢。然而「東部聯軍司令部」之設尚無資料證實。

中共兵力雖衆但裝備窳劣，它不能以T 59戰車對抗T 72戰車，也不能以米格21對抗米格25，因此，中共首先對蘇聯求戰是不可思議的。蘇聯除萬不得已，也不願在補給線極長的情況下作戰。蘇聯或有能力擊潰中共的抵抗，在軍事上獲勝，但那并不能解決它與中共間的問題，而政治上的後遺症將使它長時間難以收拾。SALT II條約問題、古巴駐軍問題、西歐配備新型飛彈問題、因越南難民問題招致的聲譽低落及在東南亞遭受疑懼問題等等，已使克宮領導者頗爲苦惱，目前實非對中共用兵之良機。依目前情況論，中共和蘇聯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仍是極微的。

## 五 東北亞遭受的軍事威脅

依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料，中蘇邊境蘇軍四四師中有些駐紮堪察加半島、庫頁島及千島列島，自非以中共爲進攻目標，故中蘇邊界蘇軍，實際不過四〇——四二師<sup>⑧</sup>。由此可見，蘇聯增兵遠東，其目標決非以中共爲限，且蘇聯仍在繼續加強其遠東軍力中。據悉蘇聯附有三個彈頭的SSQ中程飛彈已配置在遠東。其太平洋艦隊現有艦艇七五五艘（約一三三萬噸），兩艘航艦之一的明斯克號（四萬三千噸）已駛來遠東。伊凡洛奇夫型水陸兩用強襲運輸艦亦將配置於太平洋艦隊。另據日本「讀賣新聞」報導，蘇聯將在遠東地區配置逆火式轟炸機一個飛行隊（共九架）。又美方情報稱現已有十五架，今後每年增五架，最終目標爲四〇——六〇架，如從伯力起飛，即使不在空中加油，也可把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菲律賓列入其行動範圍內；如果在空中加油，則可直飛美國本土西海岸。近聞該項轟炸機配備地點爲海參崴以北的青年城（Komsomol'sk-on-Amur），又近傳外蒙已配置該型飛機。

不久前美國政府情報證實北韓總兵力約五六——六〇萬人，居世界第五位。其戰車也增至二、六〇〇輛，T 62型戰車已開始在國內生產<sup>⑨</sup>。又今年十月十三日韓國國防部長盧載鉉指出，北韓已將其武裝部隊擴充到七二萬人，它的軍事裝備包括坦克和大

註⑧ 轉自松井茂「亞洲軍事情勢現狀——美國重視中東、中共廢除『中（共）蘇同盟條約』、北韓增強戰力後的實質變化」，日文〔問題與研究〕第八卷第一

二期（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卅九頁。

註⑨ 同上，卅八頁。

砲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這早已超越了北韓防衛上之所需<sup>⑩</sup>。

最新也最驚人的消息是日本北方的色丹島上，發現了蘇聯駐軍，這使得日蘇爭議中的北方四島，除齒舞外，其餘（國後、擇捉、色丹）都有蘇聯的軍事設施，駐軍有八千至一萬人，配有 MIA 24 攻擊用直昇機、地對空飛彈、防空火炮及其他現代裝備，且距離日本本土不到五〇哩。

這些情勢的發生，使我們對某些觀念要加以重新檢討。

首先，所謂談判時代的外交鬭爭，也以維持軍事力量的均衡為主要目標之一，惟其結果常常刺激若干政權擴張軍備與加強軍事部署，那就破壞了軍力平衡，這是否會增高戰爭危機？倘使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否表示依靠外交解決國際糾紛有其一定限度！我們不可對它有超過限度以上的寄望？

其次，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 於一九六八年為文指出，在當代世界政治情況下，軍事力量的增強，已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重要的問題毋寧是在外交政策目標的關係上，如何制馭和管理軍事力量。所謂有效的抑制力，不是軍事而是心理的因素。勢力均衡本質上并非物理的而是心理的條件<sup>⑪</sup>。目前，蘇聯與北韓的行動，在東北亞是外交上劣勢，但却造成了戰略優勢與心理優勢，這在勢力均衡的觀點上該予如何評價？目前季辛吉本人認為，美國對蘇聯的戰略優勢，將於今年結束。他建議美國增強其傳統武力並使其戰略武器現代化<sup>⑫</sup>。這是否表示軍事力量的增強與心理因素，都有其重大的影響？

復次，日本視蘇俄的遠東兵力為潛在的威脅，這是說威脅並不是當前的，但它是確實存在的，這也是日本政府所以對蘇聯提出抗議的理由所在。問題是這種威脅的消除，是增強軍力來對抗，還是以政治聯盟來化解？所謂政治聯盟，是否包括玩「中共牌」在內？

## 六 政治結盟下的遠東牌局

從中共和蘇聯開始分歧、到它們之間「同盟條約」的廢止，可以證明意識形態的同盟并不鞏固，因為長程目標的一致不能消弭短期利害的分歧，集體不能澈底淹沒個體。不過，當前聯一制一的政治結盟，只有短期的和部分的利害相同，那比較意識形態的同盟更缺少黏合劑。

中共以反蘇姿態，誘引西方和它政治聯盟。西方希望它能牽制蘇聯的力量，但它却想把蘇聯的壓力轉移給西方。

註⑩ 中央社漢城（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路透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十四日）第一版。

註⑪ 福井治弘「尼克森與季辛吉」，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二年）三月號。

註⑫ 美聯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科隆電，臺北，（中國時報）（同月十二日）第五版。

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來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指蘇修是「聲東擊西」，抨擊西方想把蘇修這股「禍水」引向中國（共）。一九七七年八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仍然指摘西方想把新沙皇「禍水」推向東方，保全自己。一九七五年五月鄧小平訪法，一九七九年十月華國鋒訪問歐市四國，乃至中共之支持北約組織，其目的都在促使西歐反蘇，在西線牽制蘇聯的軍事力量。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談話中，支持日本向蘇聯索還北方領土；一九七八年中共強求在與日本的「和約」中加入「反霸條款」；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報」呼籲日本對蘇聯提高警覺，其目的都在促使日蘇更尖銳對立。

中共拉攏美國，贊成美軍暫留亞洲，意在挑撥美蘇衝突，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美國未放棄與蘇聯「和解」的想法；日本仍然高唱全方位外交，要在莫斯科和北平之間維持等距離；西歐一向不願過分刺激蘇聯；就是中共也不準備激怒蘇聯，使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於是中共與西方政治聯盟的實質是，一方面都以蘇聯為共同敵人，一方面都想把蘇聯那股禍水推向對方，另一方面自己都想和蘇聯有某種程度地緩和關係。對這樣一個同盟，不能寄予過高的希望，就是維持現狀也常會遇到困擾。

依目前形論，這個政治結盟中的獲益者乃是中共。西方唯恐中共跑回蘇聯陣營，就給予援助以資防止，於是中共就以反蘇姿態和現代化（也意味着開放市場）的口號，向西方博取實質利益。但這也不是無限制的。中共的軍事與經濟力量極為脆弱，政治局面極不安定，缺乏牽制蘇聯的能力，它與蘇聯之間的實力差距愈來愈大，沒有那一個國家有力量幫助中共現代化，提高它的軍事力量到足與蘇聯抗衡的水準。日本對經援中共興趣較高，但它要和蘇聯改善關係，對蘇聯要求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就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蘇聯要求日本對蘇經濟合作應與對中共的合作保持同一水平。姑不論日本有無此種心意與實力，同樣援助那樣敵對的雙方，將永遠後日之大患，乃是無可爭議的結果。

今年一月鄧小平訪美期間，公開呼籲美、日、西歐與中共團結抗蘇。目前中共的對外活動重點，也有意加強這種反霸統一戰線的色彩。金融時報駐香港記者鮑林撰文指出，中共編織了一個衝突網，使外國紛紛捲入它和越南的爭執中<sup>⑨</sup>。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不過，中共和越南的衝突原是它和蘇聯衝突的一部分，因此，這也無異說西方已過深地被捲入北平和莫斯科的衝突之中。正是爲此，蘇聯在遠東增強實力，固然也出自它的既定政策，但因西方聯中共制蘇聯的政策而加速了它的步調，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玩「中共牌」是美國重歐輕亞政策下的產物，它希望中共將蘇聯軍力吸引在東方，以減輕它對西方的威脅。這一設計並不成功，因爲蘇聯在東方加強部署的同時，也正增加其對西歐的壓力，並在非洲等地從事擴張。而且，這個設計基本上對東方自由國家不利，因爲蘇聯增強遠東軍力，就威脅到亞太地區的安全，而東北亞首當其衝。依照歷史經驗言，蘇聯勢力伸展到某一地區，很難期望它會自動退出。

註⑨ 中央社記者楊孔鑫（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倫敦電，臺北，〔新生報〕（同月七日）第一版。

蘇聯在東方的外交與軍事行動，對中共構成包圍形勢，但它的動機並不完全限於對付中共。回憶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英國正式宣布，英軍將於一九七一年年底之前，從蘇彝士運河以東撤退。一九六九年三月美國國防部長賴德 (Melvin R. Laird) 訪越歸國後，美國即開始實施越戰越南化，顯示美國在亞洲不願再介入陸上糾紛。同年五月廿九日蘇聯「消息報」即刊載馬特維耶夫 (V. Matveev) 所撰「填滿的『真空』」(Saturated "Vacuum") 一文，表面上否認亞洲有所謂「真空」，骨子裏是企圖由蘇聯來填補西方撤退後的亞洲權力真空。六月七日布里茲涅夫在第三次世共會議中聲稱：在遭受爆發軍事衝突威脅的地區，確立集體安全體系是必要的。「事態發展所至，也應將在亞洲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任務提到日程上來」。蘇聯這個口號提出的當時，曾受到自由世界的嘲笑，但它却執着不放，用雙邊「友好合作條約」等方式着着通行，到現在中共就不免驚呼「亞安體系陰魂未散」了<sup>⑭</sup>。但亞安體系並非單純對付中共，即使蘇聯和中共的關係有所改善，其亞安體系的構想也不會放棄。

蘇聯在亞太地區的作爲，本屬其世界戰略的一部分。如果搶奪「邊緣地帶」的戰略要衝，遮斷海上的貿易及運油路線，威脅西方國家的原料及能源供應，在不致爆發核子大戰的限度內從事擴張，在全球爭取有利的戰略地位，以不戰而勝的姿態與西方作最後攤牌，是蘇聯的全球戰略構圖，那麼東亞的兩個半島——中南半島與韓國半島，對蘇聯言就至爲需要。蘇聯支持越南的「印支聯邦」計劃，據傳它已取得金蘭灣的使用權，那對蘇聯海軍在亞太洋乃至印度洋的活動都有幫助。我們很難想像蘇聯會忽視韓國半島，因此爭取北韓也將是它的重要工作之一。事實上，一九七八年布里茲涅夫東巡，恰巧是韓美聯合軍事演習和日本全國掀起軍備問題大辯論之際，那多少帶有在精神上支持北韓的意味，而北韓爲發展其經濟及軍事力量，也無法擺脫對蘇聯的依賴。至於中共，過去強拉越南反蘇，反將河內推向莫斯科，使自己腹背受敵。吸取了此一教訓後，它在韓國半島不會重蹈覆轍，而將竭力拉攏北韓。可以斷言，在可預見的將來，北平和莫斯科將以軍援援助競相爭取平壤，不會運用影響力去干涉北韓的行動。

## 七 中 (共) 蘇談判的前途及其影響

在前述種種情況下來分析中共和蘇聯關係的發展，就比較容易看得清楚些。

中共和蘇聯目前都未希望恢復五十年代的關係，而只願就國家關係作有限度緩和，那種可能是存在的。中共內部經濟困難，政策搖擺，派系分歧，權力鬭爭不已，絕難安定團結，故屢次聲言它需要和平的建設環境，蘇聯同樣有經濟困難，現今並非用兵良機。中共和蘇聯都重視對西方的關係，但也都是爲本身利益着想，不會爲西方利益去火中取栗。又依中共「新華社」報導，雙方同意國家關係談判和中蘇邊界談判，都是在莫斯科和北平兩地輪流舉行<sup>⑮</sup>。如果關係改善不以解決邊界爭端和撤軍爲先決條件

註⑭ 楊行方塊文章標題，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第十一版「新語」欄。  
註⑮ 中共《新華社》(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莫斯科電，香港《文匯報》(同月九日)第二版。



，妥協會比較容易些。

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王幼平於今年九月廿三日抵莫斯科，在機場談話時聲稱，中共代表團「懷着對蘇聯人民的友好感情和改善中（共）蘇兩國關係的真誠願望，來到莫斯科」。「我們真誠地希望通過即將開始的談判，能够使兩國關係切實得到改善」<sup>16</sup>。葉劍英在中共政權成立三十週年紀念講話中，也未抨擊「社會帝國主義」。惟在鄧小平、李先念等對外賓談話時，依然攻擊蘇聯。蘇聯則大量發表文章、放映電視影片，對中共三十年的歷史、對外政策及「四個現代化」進行全面攻擊。「遠東問題」雜誌更指稱，今後只有在同蘇聯的「聯盟和兄弟合作的道路上，中國（共）才能取得真正的民族復興，保證社會主義的發展」<sup>17</sup>。此外，雙方談判的議程都遲遲不能協議，顯示雙方關係的改善也並非容易。

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同盟條約」失效前，應該有一項新的文件作為代替，以維繫雙方的相當關係。關於這一點，北平和莫斯科似乎有相同的、並非默契的默契。不過，中共希望雙方就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係進行範圍廣泛的談判。除中蘇邊界談判應該繼續進行並早日取得結果外，談判內容還應包括消除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障礙，確定兩國關係的準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貿易、科學、技術、文化交流等各項問題，根據談判結果雙方簽訂相應文件。中共還認為，在交換文件的過程中每一方已經提出的問題，都應列入談判議程，由雙方進行平等的討論<sup>18</sup>。但蘇聯不願如此，只重複強調它過去所提有關可能談判的目的與主題的具體建議，計有：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所提有關以特定的國家間文件明文規定，不以任何武器包括核子武器來互相攻擊的雙邊義務；一九七一年所提有關簽署不使用武力條約；一九七三年所提有關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七八年所提有關詳細擬定蘇中（共）相互關係原則的一項共同文件<sup>19</sup>。蘇聯有意用這些文件代替即將失效的「同盟條約」，藉以抵銷或沖淡它所指摘的美、日、中共三角同盟。

回憶今年四月三日中共通知蘇聯廢約後，四月七日蘇聯「真理報」發表文章，使用「反蘇主義」(Anti-Sovietism)、「大國霸權主義」(Great power Hegemonism)以及「擴張主義」(Expansionism)等名詞抨擊中共，這也正是過去中共用以抨擊蘇聯的名詞。由於中共「教訓」越南，頗有霸權主義的味道，為若干第三世界國家所不滿。在越南擬定的憲法草案序言中，指稱越南正面臨着包括柬埔寨傀儡（意指波布政權）在內的中共擴張主義與霸權主義的威脅。其第一章第十四條則聲言要支援全世界人民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大國擴張主義的鬥爭<sup>20</sup>。蘇聯使用同樣名詞，就意味着它要支持越南對中共繼續鬥爭，同

註<sup>16</sup> 中共《新華社》（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三日）莫斯科電，香港《文匯報》（同月廿四日）第二版。

註<sup>17</sup> 同註<sup>16</sup>，中共《新華社》莫斯科電指「遠東問題」雜誌（一九七九年）第三期上，共有十六篇反中共文章，所引文章標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年」。

註<sup>18</sup> 同註<sup>16</sup>，中共《新華社》莫斯科電。

註<sup>19</sup> 蘇聯外交部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致中共備忘錄。

註<sup>20</sup> 參閱《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九年八月廿一日）第五面。

時也防止北韓倒向中共一邊。而中共和越南的關係發展，也將影響到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前途。

「新華社」在報導談判議程難決時，指摘蘇聯惡習難改，還在以教師爺自居，妄圖教訓中國人民應當怎樣思考、生活、選擇什麼樣的道路。這只能暴露出他們喪失了歷史感，想要支配別人的幻想。如果蘇聯方面採取這種態度來處理國家關係進行談判，肯定是行不通的。在兩個主權國家間的談判中，平等協商才是唯一正確的途徑。在「新華社」同一篇報導中，翻來覆去連用了不少「平等協商」字樣<sup>②</sup>。這顯示中共因實力過弱，漸求與蘇聯處於平等地位而不可得，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倘若蘇聯肯予中共以較為平等的地位，而又應允稍稍緩和邊界緊張情形，中共又將如何？那倒是深深值得玩味的。

中共急求現代化，其目的之一即在增強實力，以提高與蘇聯周旋時的地位。但現代化需要外援，又需要一個和平的建設環境。援助要求之於西方，緩和要求之於北方。中共可以拉攏西方的姿態對蘇聯要挾，又可以對蘇妥協的姿態向西方勒索，而蘇聯也可以某種程度地玩「中共牌」。目前，中共和蘇聯的談判尚在開始階段，對其結果暫難遽下斷語。惟雙方將不會使彼此關係進一步惡化，並追求在對己有利的條件下緩和緊張。雙方修好的可能時機為克宮權力交代時，「同盟條約」失效前或一九八〇年代後半，尤以後者可能性較大。

西方認為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蘇聯的軍事力量將發展至巔峯，而經濟成長將接近零點，那是它對外冒險的危險期。從中共方面看，那時候它能從西方得到的業已到手，暫時難以繼續增加，它自不願甘冒毀滅性危險而亟思對蘇妥協。此外，蘇聯「消息報」政治評議員亞歷山大·波文(Aleksandr Bovin)則判斷蘇中(共)關係正常化最早也得到一九八〇年代後半開始。他認為那時候中共領導者為誰不得而知，但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中共領導階層會到與強大的鄰國蘇聯關係正常化，才符合「中國民族」的真正利益。反之，漫長的國界線上存在着強大的敵人，是與中共的「國家利益」相反的。可是，中共對此澈底瞭解，還需要一段時間。因此，他作了上述的判斷<sup>③</sup>。倘若此一妥協出現，則遠東情勢將全部改觀，首先受威脅的又是東北亞。

現今國際政治雖已不重視意識形態，但西方仍不斷就心中與蘇聯復合，而不惜用援助中共的方式去加以阻止，實際上仍然默認意識形態影響力的存在。中共在和蘇聯對立時爭取西方援助，實無礙於他日與蘇聯改善關係。可是，從亞洲立場看來，除了一個超強蘇聯以外，統一的越南，已是一個軍事大國，北韓的軍力也提高到世界的前列，如果再加上一個由西方扶植壯大的中共，它們又都和自由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處於絕難妥協的對立地位，那情形是不堪設想的。

據悉，美國最近的若干措施，似有改變其亞洲戰略的意向。我們亞洲國家除歡迎此一趨勢外，如何聯合一致，爭取自己的戰略優勢、政治優勢與心理優勢，以立於不敗之地，應該是不容等閑視之的事。

註② 同註①，「新華社」莫斯科電。

註③ 波文係於訪日時發表此項談話，見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第五面。